

● 中国文学

边缘人的小叙事

——陈染小说的话语特征

黄树红¹, 翟大炳²

(1. 广东教育学院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310; 2. 芜湖师专 中文系, 安徽 芜湖 241000)

[作者简介] 黄树红(1941-), 男, 广东惠东人, 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翟大炳(1939-), 男, 安徽芜湖人, 芜湖师专中文系教授, 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摘要] 陈染小说内部的是非判断与众不同, 显示了鲜明的边缘倾向。它对习惯于中心话语的读者提出了新要求, 也是一种历史方法的恢复。

[关键词] 小叙事; 主流社会; 中心话语

[中图分类号] I 206. 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6-0870-04

我们用“边缘”一词来概括女作家陈染的小说特点。要准确把握她的小说, 有必要从作品的内在价值尺度入手。

小说内在的是非判断标准, 无论与读者的成见一致还是相反, 它都能轻松地介入读者的情绪体验。即使水火不容的政治集团, 分属于他们的小说由于体现各自的价值准则而俨然对垒, 但趋同性仍十分明显, 那就是双方好比天平的两端, 都依赖同一个中央支撑点。两种价值准则互为参照, 具有深细的可比性。因此, 一个集团的读者阅读敌对集团的小说, 是不会感到迷茫的。至于集团内部, 小说的意识情态与读者本有的价值标准同轨, 小说家不过在替读者表达。这是一般的情况。

小说依据的价值判断可以有另一种情况: 小说的是非标准既不与读者的相同, 更不相抗, 而是游离于读者的。这类小说给读者造成了相当的阅读困难。当读者试图索解小说的意义时, 却总感到无孔不入, 似乎是以规测矩, 用方量圆。这一类小说严重偏离了读者建立在中心话语体系之上的读解心理, 显出它的边缘特征。

历史往往让新奇变得陈旧和老套, 所以, 表述“边缘”和感受“边缘”, 只在当代才有意义。这一方面

解释了边缘化小说少有出现的原因, 另一方面, 更能让我们看清陈染小说另类的依据。

小说作为一个虚拟世界, 必然内在地存在一套价值体系, 对小说的人物和事件做出评价。这一套评价标准与现实的中心话语的关系如何, 将从根本上影响小说的风貌。陈染小说之所以给读者异样的感受, 是因为中心话语的价值体系被摒除, 小说内部的是非判断被明显地边缘化。陈染写小说的这种方式, 在当代众多作家中是一个少有的例外。让小说边缘化, 也许是陈染苦心的私人创造, 却与中国过去的小说家暗同。陈染小说的特别意义, 在于它使一种长期隐潜在历史里的创作方法浮出水面。至于这种沟通是否真地从传统孕胎, 那无关紧要。值得着重考虑的是效果。如果一种历史的艺术方法失而忽得, 而且这之前经过了漫长的埋没岁月, 事实本身便足以证明它的价值。陈染小说的这种方法意义, 可以由对中国小说方法的历史考察中得到说明。历史考察离不开具体社会的主流意识、价值标准, 我们这里采用一种宏观处理方式, 抛开无实质影响的细节, 将不同时期的社会规范当做一个总体, 直接从中心话语入手, 历史地回顾各时期小说与中心话语的关系。

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必须具备一套对大众具有权威的中心话语体系,以便监督辖区内的一切行事。明晰的中心话语一旦形成,便当仁不让地主宰整个社会,甚至活动能量极大的政权运作,也不得不处处屈服于中心话语的威压。典型的例子可以举出中国的儒家传统。孔子曾教诲弟子,管好一个国邦,足食强兵都不是最主要的,第一大事是让百姓懂得礼仪廉耻,其着眼点在于建立牢固的中心话语。由于他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时代,社会尚缺乏一个明确的中心话语,孔子以至后来的孟子,都没能实现自己宣称的“王道”。一旦等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周孔之道就占据了高于皇权的舆论优势,无论如何改朝换代,它都强霸地维持了中国近二千年的封建思想统治。在正统的儒家礼仪控制下,像曹操那样的人杰,尽管掌握着国家的实际统治权,又雄心勃勃,却始终未敢称帝,背后原因就是怕蒙上儒家意义上的“乱臣贼子”的恶名。

有意味的是,面对中心话语圈定的雷火线,政治家不敢轻易触摸,普通百姓更是战战兢兢,趋避三舍;部分小说家却大胆利用艺术空间的虚拟性,对中心话语视之蔑如。

在中国,小说家对中心话语的颠覆尤其具有深意。因为中国向来视文学为载道的工具,言志抒情的诗歌,宗经征圣的散文,都担负着流播教化的政治功用。特别是诗,一直被当做诗人心声的真实流露来对待,作者可以因诗获罪,因诗受赏。后来的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背后的依据正是中国诗歌的一贯“写实”品格。相较之下,小说的传统地位非常低,既没有资格像诗歌那样展示襟抱,也远不能与宣传道统的散文平列。它作为茶前饭后的谈资,尽可以子虚乌有地杜撰。从早期的《搜神志》、唐代的传奇,宋代的话本、明代拟话本,到清代的《聊斋志异》,内容常涉荒诞,有违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这其实显示了小说别是一类,它允许对现实生活有相当的偏离。

偏离现实,可以获得某种奇特的表现效果,或者使不便明言之事曲折显白,但不就意味着逸出中心话语的圈地。展示神魔世界的《西游记》、极写鬼狐的《聊斋志异》,虽然与众不同,却都严格采用了现实社会的价值准则。小说家的揶揄讽扬,针砭时弊,目的只在纯洁中心话语。

《水浒传》有些不同。它为好汉世界立了一个标准:不贪女色和金银,便足称英雄。历来算作恶行的打杀无辜,使酒斗狠,偷盗抢劫,被摒除在小说是非标准之外。好汉们有各种非常行径:李逵对普通百姓一路砍杀,张青、孙二娘夫妻谋害过往客商,时迁掘

墓盗财……本是些令人不齿的匪盗勾当,却由于好汉标准的遮掩,不让人生厌。

但《水浒传》的传统忠义主题引人注目,淡化了小说在价值参照系上的边缘色彩。尽管如此,它因“海盗反朝廷”、“不忠不孝”而被过去的统治者诅咒,也因“大义大忠”、“不反皇帝”而受到革命家的讥刺;大相径庭的两类看法,暗示了小说的边缘现象仍然不容忽视。

《水浒传》的许多故事源于民间,属集体创作,故而存留了相当多的俗众意识。在它之后的《西游补》、《红楼梦》,为小说家私人创作,性灵得以自由伸展,小说家又精心构想,两部著作遂成为别前异后的殊品。《西游补》设想一个青青世界,没有忠、孝、节、义的礼法,只是梦幻中一境。它抛弃了现时社会的是非判断,情节在纯粹的想象里流动。《红楼梦》明显受到过《西游补》的影响。大观园的宝玉,情状异常,说不得贤,说不得不肖。时流崇尚的功名科举、忠君报国、孝悌礼义等,在宝玉身上被洗净一空。但是,小说没有在通常的意义上暴露时代的弊病,反而将现实虚化,让人物在特别设置的环境中表演。恰如作家自言,小说无伤时骂世之旨,它的人物事件评价标准只一条: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大观园的多方表演,从各个角度强化着这一核心主题。

《红楼梦》判事的特殊性,从与《儒林外史》的比较看得更清楚。就两部小说对八股文的态度来说,宝玉憎恨八股文,出于追求天性真情的诗人性格。至于八股文会怎样影响现实,宝玉根本不关心。《儒林外史》开篇敷陈大义,用隐士王冕的话,表达对八股取士的忧虑:“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现实参与意图十分明显。它多处流露对八股文的反感情绪,意在揭出弊病,寄望改进。《儒林外史》称扬了清政爱民的官吏、忠君显亲的孝子、传播教化的名士;《红楼梦》没有这类东西。两部小说的价值参照系不同。《红楼梦》很特殊,它浮空在现实是非之上。

自设价值规范的小说毕竟不多,而且规范的虚设性未必被注意到。普遍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小说家不假思索地将现实的评价标准带入小说世界。尤其自清末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后,小说开始自觉干预现实生活。此后,抗日战争时期宣传救亡图存的进步小说、建国初期的反映新风气的小说、“文革”结束后的伤痕文学、以及后来的寻根文学等等,都浸透着时代精神。小说家在固有的时代价值框里构建故事,因为评分标准早已命定,表演的随意性不大。

中心话语按照既定的价值标准和审美情趣规范

所有人的思想和行为,如果一旦凝固成一个封闭的僵化体系,必然会对少数处于边缘位置的人群话语置若罔闻。这样的中心话语常是陈词滥调,是不假思索的官话、套话和惯用语。要避免中心话语的负面效应,小说家宜以一种“业余爱好者”的态度突破“专业化的局限”:“既不遵循预定的方案,也不能顺从某种口号、正统的党的路线或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不断地“质疑”^[1](第 69 页)。小说家循此一路,难免使习惯于中心话语的读者受到猛烈的思维及情绪撞击。拿陈染来说,由于她的小说逸出了主流社会的中心话语轨道,就要求读者具备较高的领悟力。不过,任何困惑都只能是暂时的:问题既已提出,答案终将显现。王蒙对陈染“边缘化”小说的感受过程很典型。他认为陈染小说是“陌生”的,“似乎是我们文学中的一个变数,它们使我始而惊奇,继而愉悦,再后半信半疑,半是击节,半是陌生,半是赞赏,半是迷惑,乃嗟然叹曰:‘陈染,你是谁?’”^[2](第 104 页)。

用中心话语的尺子去度量,陈染小说中的人物大都属于反常的“病人”。小说描写了各种“病态”。有生理变异的病患者,如“性缢死”者;有同性恋,如女主人公黛二与一个叫伊堕人的女人相依相恋,致使黛二的母亲向伊堕人发出警告:“请不要拉我女儿胡闹,请不要诱惑我的女儿鬼混,她一直是个好孩子。”陈染不讳言她小说中的众多人物有“病”,更多是从广义上说的。那些角色尤其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从中心话语看是反常的。

反常往往意味着颠覆传统。比如大学女教师黛二,为追求现代文明而到美国,“原以为美国现代文明可以解脱她有生以来的忧戚与孤独,以为那里的自由、刺激、疯狂会使她的精神平衡起来”,然而不到一个月便厌倦了。她只得回到国内,为寻找新的工作而东奔西走。她对性爱的看法不只是与传统观念迥然不同,而是不相关涉,纯乎是另一道上的人。黛二认为女友的丈夫墨非是一个窝囊的男人,却照样与他调情;她不喜欢美国学生琼斯,仍多次与他做爱,而且兴奋得死去活来。“她坚信爱情与做爱、情爱与性爱是相互关联的两件事。”她既是这一看法的言者,又是这一看法的行者。

在陈染的小说里,与情感脱离的纯粹性爱并不鄙陋,甚至可以具有诗意。黛二仅仅出于生理的需要,与她根本不爱的一个叫大树枝的男人做爱,竟如此酣畅:“黛二在我怀里像一个温凉的梦立刻溶化了,她的整个身体变成一棵可被砍倒的软乎乎、软绵绵的白桦树,全都倚在我身上。我被她那绝望的微笑和泥一样的瘫软的目光照射得欲火中烧,连空气都

弥漫在一股使人浑然倦怠的热乎乎的芳香里……黛二在我的怀里,仍在轻轻地呻吟,仿佛我刚给她注射了一针麻醉剂似的。”这样的—个特别女人,在历来受中心话语主宰的小说里很难看到。

黛二与母亲的冲突显现了她所在的边缘点距离中心话语有多么远:

“看看你交的这些男男女女的朋友,一个个是……”

“流氓。”

“我可没有这样说,我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出格,一件接一件干荒唐事!你就不能像个听话的女孩那样……”

“那样不胡思乱想,不做梦,安分守己过日子。”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反正是没有必要跟那些男男女女勾勾搭搭。”

“我就是勾勾搭搭,就是喜欢当娘子,你不必指望我!”

类似黛二这样的边缘化人群,在实际生活中可以找得出。既然是一种存在,不管主流社会的中心话语承认与否,它本身就有价值判断,与主流社会的中心话语产生关联:冲突或融合。边缘化人群是一个小小的“失声集团”。英国人类学家秀莉·阿登那和埃德汶·阿登那说:它“处于主宰域之外,被称为‘野地’。”“这里既荒芜又充满生机(因为它从来也得不到正统文化的直接‘照耀’)。”^[3](第 214—215 页)“失声”并非无声,而是中心话语为王的社会对她们充耳不闻。沿此思路,陈染似乎要以个人化的方式呼唤大家关注边缘人群:大家同在一条诺亚方舟之上,身边有一个女性组成的小小“失身集团”,能视而不见吗?

理解还可以向另一面。任何一套中心话语,其权威是有限的,尽管它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公众意识,是光辉四射的太阳,但照不到个别曲折隐蔽的死角。对于冥顽不化者,中心话语爱莫能助。陈染小说里的诸多边缘人,何尝不是暗示了这一点。

如果抛开从小说外面加入的理解意义,直接从小说本身看小说,结论会变得单纯,也因此而更可靠。从技术上单刀直入地观照陈染的小说,它的奇异使人不禁想起巴赫金对拉伯雷《巨人传》的评价。巴赫金认为《巨人传》“狂欢节”式的风格具有特别意义,就在于突破了历来文学创作的“官文化的框架”^[4](第 41 页)。对于陈染,我们亦当作如是观。

陈染的小说采用一种“小叙事”方式,而与“元叙事”区别开来。

所谓“元叙事”,按照利奥塔的说法,“确切地是

指具有合法功能的叙事。”“合法”就是要给叙事赋予权威,也就是官方叙事。“这些叙事,有给政治运动、社会制度、思想方法等提供权威的功能。”^[5](第253页)这样的“元叙事”,经常因霸道而肆无忌惮地制造虚假文本,剥夺个人的话语权利。“元叙事”的这一品格缺陷,已经被人察觉。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道德主义就是其中最蛮横的一种,“在任何时代都有它特有的堕落,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堕落不是追求感官享受或者所谓淫靡作风,而是整个社会对于个体的蔑视,对于个体的敌意与恐惧,将个体降为群众,使其成为无个性、无自主的一般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不道德。”^[6](第68—70页)

至于“小叙事”,作为一种小范围内的话语,可能气势不大,也不宏伟,甚至与社会的中心话语相抵牾,但是,它是最真实、最个人化的“活着”。“小叙事”作品对由中心话语滋养起来的读者提出了要求:读者必须抛弃成见,超越旧我。否则,“小叙事”很可能成为作家与读者难以沟通的“私语”。如果这样,也就无怪乎人们惊呼“陌生的陈染”了。

其实,只要能突破惯常的中心话语的羁绊,不难看出陈染的小说并不陌生。暂且不论其艺术表现蕴含的那些似曾相识的西方文学大师的笔法,只就其创作所显露的心态来说,我们认为她的边缘化小说从价值体系上进行虚拟,从而与中心话语无涉,它是中国式的,是流而不是源。此种方法可以上推到《西游补》,甚至《水浒传》。只是由于多年来中心话语写作的一统天下,使大多数人看不清这种源流关系。

边缘性依赖于中心话语,中心话语变了,原本处在边缘的东西可能坠落虚空,也可能移向中心,无论怎样,都容易被读者误会为昔日的现实。《西游补》、《红楼梦》从某个时间开始,一直被视为讽刺时弊的悼世之作,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两部小说的是非标准出于作者虚设,不受产生时代的价值羁绊。时代的变迁,又给后人理解的灵活性以种种机缘。比如,宝玉与丫鬟的互敬互怜,“五四”之后的读者看到的是主仆平等,很难如康乾读者那样感受到钟鼎列侯家贵公子的异化色彩。

所以,小说的边缘性最能被当代读者感受。陈染是当代有个性的作家,作为当代读者,我们感到,她的小说别是一路——在虚拟的体系上造大厦。

[参 考 文 献]

- [1] 张隆溪. 赛义德笔下的知识分子[J]. 读书, 1997, (7).
- [2] 王蒙. 陌生的陈染[J]. 读书, 1996, (5).
- [3] 刘慧英. 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5.
- [4] 钱中文. 论巴赫金的交往学及其人文科学方法论[J]. 文学研究, 1998, (1).
- [5] 利奥塔. 后现代与公正游戏[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6] 葛红兵. 晚生代的意义[J]. 山花, 1997, (7).
- [7] 陈染. 陈染文集: 第1卷[Z].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责任编辑 何良昊)

Social Marginal People: Mini-narration

HUANG Shu-hong¹, ZHAI Da-bing²

(1. Chinese Department, Guangdong College of Education, Guangzhou 510303, Guangdong, China;

2. Chinese Department, Wuhu College for teacher training,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Biographies: HUANG Shu-hong (1941-),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Chinese Department, Guangdong College of Education, majoring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s; ZHAI Da-bing (1939-), male, Professor, Chinese Department, Wuhu College for teacher training, majoring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s.

Abstract: CHENG Ran's novels, whose contents usually stand in the margin of society, are out of the ordinary at the point of right and wrong. Therefore, it asks for a new way from those who are so used to writings of central discourse. However, an old writing method hard to remember comes back to life.

Key words: little narration; main society; central discourse